绝望的反抗与自然的呼唤
——《阿 Q正传》《边城》生命观比较

刘玉芳, 历彦军①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鲁迅和沈从文通过《阿 Q正传》《边城》的文学创作阐述对生命和人生的认识,执著而痛苦地探寻生命意义与价值。鲁迅要求我们要正视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并且反抗一切妨碍国人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黑暗。沈从文则认为,生命是上帝的造物,本质上是美丽的,生命本性只有在其最初家园即自然中,才能得到真实而充分体现。文章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即生命形态:卑琐萎缩与刚柔相济的不同展演;生命内核:祖先崇拜和爱与美的张扬;生命归宿:摧毁奴隶根性与天人合一的境界。

[关键词] 《阿 Q正传》; 《边城》; 生命观; 比较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6-0093-03

鲁迅在《华盖集·杂感》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执著现在,执著地上。这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哲学。他关心的是当下活着的中国人,关注的是他们的生存困境,而"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苦难是特别深重的,因此,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1],要执意反抗,和现实的黑暗"捣乱",这是鲁迅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真正目的所在。因此,鲁迅在《阿 Q正传》中塑造阿 Q这个典型人物时,"哀其不幸"更是"怒其不争"。如果受压迫者苦苦地受着欺凌与煎熬而只知逆来顺受,不知抗争,那么,他们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国家、民族的社会革命也就无法成功。通过阿 Q及其生存的环境——未庄,作者展开了过去几千年中国人生存图景,展示了他们的愚昧与麻木,但作者的目的是借此更好地立足于现在,着眼于当下,提出自己绝望后的反抗。而沈从文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忧虑和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将深沉的目光投向了人的生命本体。面对黑暗残酷的现实,沈从文欲"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振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的舞台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2]因此,在"边城"这个理想化了湘西生命世界里,作者对人类原始生命进行热情讴歌,其目的就是揭示生命本然的文化内涵,让人类以一种顺应自然、合乎人性生命形式进入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

一 生命形态:卑琐萎缩与刚柔相济的不同展演

阿 Q和他周围的人们有一种共同的退让畏缩而卑琐的人格,他们猥猥琐琐地苟活着,表现出冷漠、麻木、愚昧的精神特质。通过他们,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鲁迅对于改造国民性的迫切愿望。"愚弱的国民"给我们以强烈的感触,是在阿 Q因为说出自己姓赵而被赵太爷扇了嘴巴的时候。诚然,阿 Q认为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于他也很光彩"是出于一种封建宗法观念,其实众人又何尝不如此,否则他们就不会在听说之后对阿 Q"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然而,接下来就是赵太爷大骂阿 Q是"浑小子",呵斥他"你哪里配姓赵",这时众人就都变了态度,不仅"都说阿 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3]488。为什么"即使真姓赵"也说不得呢?为什么"有赵太爷在这里",说了自己姓赵就算"胡说"呢?这反映在封建尊卑等级观念的荼毒下,孰是孰非已没有了标准,所有的人都在一种混沌之中,浑浑噩噩地活着,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也就是必然的了。闲人们拿阿 Q取乐,甚至无端寻衅到这地步:捏住阿 Q的辫根,在墙上碰响头,还非要阿 Q承认这是"人打畜牲"不可,这不难看出他们的无聊。对于阿 Q的蒙冤被杀,村里的人们却见解一致,"自然都说阿 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3]527这种逆向推理的逻辑很可笑,这是盲从者的逻辑。盲目地"唯上是从"已成了长期生活在封建等级制度统治下的芸芸众生的一种本能反应。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唯上是从"的民众,这样的民众愈多,封建统治秩序就愈容易维持。这样的民众如此之多,却也正是鲁迅深感悲哀的!

沈从文所追求、所表现的却是另外一种生存形态。他认为,有两种生命形式是完美而永恒的,可以成为未来社会的性格典型,即勇敢雄强和诚实天真。天保虽出身富裕人家,但绝无弱不禁风的病态容颜,也毫无从小养尊处优生活带来

[收稿日期] 2009-10-20
[作者简介] 刘玉芳(1976-),女,湖南双峰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①武警警种指挥学院副教授。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脆弱痕迹,而是极其健康、强壮,浑身洋溢着青年男子雄性的生命魅力。当弟兄俩都悄悄爱上翠翠之后,“兄弟两人在这方面是不至于动刀的,但也不作兴有‘情人奉让’如大都市懦怯男子爱与仇对面时作出的可笑行为”[4]81。他们“遵照当地的习惯,很诚实与坦白去为一个‘初生之犊’的黄花女唱歌”[4]83-84。他自知不是傩送的敌手,就主动退出,离家远行,虽最终坏了事,但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是大山一样的雄强、进取,浑身洋溢着原始的蛮性力量。实际在沈从文看来,最理想的生命形式是刚柔相济,既要有刚的一面又要有柔的一面,这种搭配能使人的生命形式处于和谐适调的状态。这与湘西的自然和文化是相适应的。在《边城》中,翠翠和傩送就是刚柔相济的典型。翠翠给人的印象是柔而不弱。她“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4]13。黑色是一种给人力感、具有刚性的颜色,作为外貌特征,它是日晒雨淋、久经磨练的结果;它同时也是一种性格特征,黑皮肤的女孩往往泼辣大胆,敢作敢为,有一股男儿气。翠翠是显性的柔,隐性的刚,柔中带刚。二老则是强而不硬的男性典型。他身强力壮,“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4]26。二老这种俊逸风流的品格是典型的刚中有柔。古朴文明中的刚柔相济,体现的是爱与美相统一的生命力充沛的自然人性[5]47-52。

二 生命内核:祖先崇拜和爱与美的张扬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3]490这是阿Q的一句经典台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祖先是整合整个家族的巨大精神力量,所以美化、圣化、甚至神化祖先形象也就成了每个中国民众的内在要求。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在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之后,阿Q便手舞足蹈的深刻内涵。在此时,家族的整体利益和荣光已处于阿Q思想的第一位,而现实生活中所遭受“本家”的压迫和屈辱已退居次席了。中国人崇拜祖先,归根到底是对祖先具有的伟大的生命力的崇拜,鲁迅以深刻的笔触揭示了这种观念对中国民众的精神扭曲。阿Q念念不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明确地体现了这种思想。当阿Q被尼姑骂作“断子绝孙”时,他深刻感受到了无后的痛苦,无法利用精神胜利法去获得心理平衡。因为生育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已带有伦理的强制性,使得像阿Q这样没有子嗣的中国民众的生命意识处于紧张之中,从而导致了个人的欲望本能与社会伦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生育后代是一种义务这一伦理观念的影响下,推动了阿Q向吴妈“求爱”,虽然这种“求爱”本身就带有它的荒谬性。《阿Q正传》深刻揭示了祖先崇拜文化对中国民众生存意识、死亡观念的深远影响。阿Q在被砍头时,虽无师却能自通地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种循环式的原型死亡观念固然受到佛教“轮回说”的影响,但它所蕴含的深层意识却无疑是中国式的。通过《阿Q正传》,鲁迅揭示了祖先崇拜文化对中国民众生活终极目的的深刻影响[6]。

沈从文是个生命力论者,在他看来,生命的内涵就是爱与美。爱和美体现的是生命中的一种和谐关系,是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边城》中有三种基本的人间亲情,即翠翠同二老兄弟的男女之爱,翠翠祖孙、船总父子的亲子之爱,老船工与杨马兵等的朋友之爱。这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间亲情,形成了茶峒也是湘西以爱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的基础。老船工以摆渡为生,对南来北往的行旅商人却毫无索取之意,反而准备大量草烟赠送于人;船总顺顺也不是以势压人的“地头蛇”形象,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为翠翠而死也不怀恨在心,老船工死后他还照样慷慨地对翠翠给予照顾。这是一种“天下同是一家人”的人际关系。“爱美”是湘西人最大的特点,他们拥有一切美物,美事,美行为,美观念。翠翠生得清秀动人,如同一头美丽的小兽,得天地山水之精髓,又喜欢采花摘草。她是湘西生命之美的典范。沈从文热情地崇拜美,在充满人性美和自然美的诗化了的湘西世界里,他发现的是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前景。沈从文主张回到古朴文明,主张的是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古典的美。爱与美的生命内涵使得沈从文的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空气,现今中国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种舒适的呼吸”[7],因为他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精髓。

三 生命归宿:摧毁奴隶根性与天人合一的境界

几千年来,中国人在儒、道、佛思想构成的精神枷锁禁锢下,自然产生逆来顺受、万事忍为上的性格特质。鲁迅就曾说:“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8]这种羊和凶兽集于一身的奴性人格,在阿Q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假洋鬼子面前,阿Q表现得空前软弱,只要见到那根“哭丧棒”,自己便“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在这只狼面前,阿Q乖乖地成了羊,任假洋鬼子欺侮。在王胡面前,阿Q虽然不甚服气,并试图获得胜利,然而,当王胡真的动手同他打起来时,自己立即又软了下来,“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既是弱者哲学,更是由狼变羊过程中的心理安慰。被奴化与甘心被奴化早已在阿Q身上形成一种定势效应,只要一见被打场面,立时做好挨打准备。正由于此,当阿Q被捕后刚被押到大堂上,便立刻“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3]522-523,就连旁边的长衫一见也鄙夷似的说“奴隶性”。“奴隶性”这三字既是对精神异化的阿Q最恰当的概括,也是包括长衫者在内的所有国民在长期奴隶文化摧残下形成的固有的国民品质[9]。

鲁迅对阿Q奴隶根性的揭示,就是欲通过批判奴隶文化与奴隶思想对国民精神的残害与吞蚀,来唤醒国民的精神觉悟,争做精神、思想上真正的“人”。“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种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10]鲁迅正是立足于几千年奴隶文化与奴隶道德对国民心灵的深层麻木与巨大创伤的现实,为解决如何争做“人”资格这一问题进行文学创作的。他认为,为了唤醒民众,必须将奴隶文化与奴隶道德彻底摧毁,把百姓的麻木灵魂唤醒,把铁屋子砸烂、毁掉。在具体行动时,他指出:“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11]226“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偏重于勇气和理性, 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 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 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11] 25这便是他给国民摆脱奴隶枷锁努力奋争开出的药方。

《边城》中, 沈从文力求生命与自然保持一种既定而安详的和谐,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境界。自然的人化也就是让自然景物带上人文的痕迹, 使自然同人契合。翠翠的生存环境是渡船、白塔和通灵性的狗, 而作者着意刻画了狗的形象。“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 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4] 15撑渡时, 黄狗如遇到船上不相识的狗, 就“或者向狗主人轻轻吠着, 或者逐着那陌生的狗”[4] 53, 于是常得到翠翠带点儿嗔恼的责骂, 这时, 黄狗就“赶快跑回船上来, 且依然满船闻嗅不已。翠翠说: ‘这算什么轻狂举动! 跟谁学得的! 还不好好蹲到那边去! ’狗俨然极其懂事, 便即刻到它自己原来地方去, 只间或由象想起什么似的, 轻轻的吠几声。”[4] 53黄狗的一举一动皆与人相似相通, 这种动物人性化的描写, 使人与自然构成了一副谐趣图。湘西人化自然形象是原始性自然经济的产物, 因此, 沈从文的回归自然, 实际上是回归到人类远古的原始农业时代。只有在那种“诗经”般的自然社会里, 人们才会“去物欲存人情”, 充分体现生命的爱和美。人的自然化也就是让人具有自然的属性, 使人同自然契合。人虽是万物的主宰, 但毕竟是自然的造物, 同万物一样都打上了自然烙印。船总顺顺是小说中豪爽正直的典范, 当老船夫死于雨夜后, 他还是毅然抛下私情, 去看望翠翠, “还跟着一个人扛了一口袋米, 一坛酒, 一腿猪肉, ”并对翠翠说“不要发愁, 一切有我”[4] 117。老船夫和船总顺顺虽然在金钱、物质、地位方面有一定差别, 但在他们身上时时表现出善良的自然的人性。沈从文是从“国家与社会重造”的时代需要出发, 引入一套传统却又具有新的内质的价值观念以参与现实。对“天人合一”的至善至美境界的追求, 实际上是沈从文试图用宁静和谐的乡村生活来抵御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的生命的物化和人性的扭曲, 其返朴归真的理想虽是消极的, 但他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5] 47- 52。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文学大师, 鲁迅与沈从文用属于自己的独特视角来透视生命, 鲁迅是站在批判和否定的立场上来看待的, 而沈从文却站在欣赏和肯定的立场上来看待的。鲁迅批判民族文化的劣根性, 而沈从文却在寻找民族文化的根, 肯定那些业已消失的传统美德和原始古朴民风。《阿 Q正传》中, 鲁迅就是通过对国民奴隶根性的解剖, 对人性“恶”的揭露, 在审美上, 把读者带入了现实的“真”; 《边城》中, 沈从文则通过对翠翠、老船夫等健康人性的展示, 对人性“善”的颂扬, 把读者带入了理想的“美”。鲁迅就希望通过对这种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揭示, 进而使国人能“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在《边城》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理想化了的湘西, 在这个世界, 风光秀美, 充满诗情画意; 人民淳朴、热情, 人心向善; 人性正直、朴素, 信仰简单而又执着; 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矛盾因为爱、美的粘合而消解, 生命与环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和谐与美好。这是沈从文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 却也是一个在现实中失落了的世界。

[参考文献]

[1] 鲁迅. 记念刘和珍君[M] //鲁迅. 鲁迅全集: 第 3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74.

[2] 苏雪林. 沈从文论[M] //苏雪林. 苏雪林选集.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9: 456.

[3] 鲁迅. 呐喊• 阿 Q正传[M] //鲁迅. 鲁迅全集: 第 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 沈从文. 边城[M]. 山西: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5] 陈爱国. 论沈从文的生命观[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3).

[6] 陈爱强. 国民痼疾与祖先崇拜—鲁迅小说一个文化学的阐释[J]. 鲁迅研究月刊, 1997(11): 48- 55.

[7] 刘西渭. <边城>与<八骏图>[J]. 文学季刊, 1935(3).

[8] 鲁迅. 华盖集• 忽然想到七[M] //鲁迅. 鲁迅全集: 3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61.

[9] 崔银河. 奴隶文化与奴隶道德是国民奴隶性的根源[J]. 鲁迅研究月刊, 1997(4): 11- 17.

[10] 鲁迅. 华盖集• 忽然想到五. [M] //鲁迅. 鲁迅全集: 第 3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3.

[11] 鲁迅. 坟• 杂忆. [M] //鲁迅. 鲁迅全集: 第 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Desperate Rebellion and the call of Nature

—— comparison of the life view in The True Story of Ah Q and The Border Town

LIU Yu- fang, LI Yan- ju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ir works, Lu Xun and Shen Congwen elaborate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about life and seek for the value of life by thinking about it. Lu requires us to face with the difficulties, to fight against all the darkness that hinders the Chinese people to exist and develop, and to be commit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ality, life and man. While Shen holds that life is made by God, which is beautiful in essence. Human is beautiful by nature, the toughest enemy of holiness of life is the lust from the real world. The nature of life can only be shown truly in na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dea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state of life, the core of life and the destination of life.

Key word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The Border Town; life view; comparison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